

关于斯密与李嘉图 劳动价值论的比较分析

潘志强 陈银娥

摘要：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来源，作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奠基者和完成者的斯密与李嘉图，对劳动价值论都有过精辟的论述，其论述对近代劳动价值理论具有深远的影响。但是，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在内容、理论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研究方法与立场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和不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以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作为构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点和平台；应从生态学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联系，发展劳动价值论，探索和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规律。

关键词：斯密 李嘉图 马克思 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一直是经济学关注的问题。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为马克思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基础，劳动价值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理论贡献。作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奠基者和完成者的斯密与李嘉图，对劳动价值论都有过精辟的论述，其论述对近代劳动价值理论具有深远的影响。但是，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在内容、理论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研究方法与立场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和不足。本文试图对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进行比较分析，以期得到一些借鉴和启示。

一、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二重性”

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者威廉·配第首先提出了价值由劳动决定的思想，但他没有建立经过详细论证的价值理论。亚当·斯密则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劳动价值论，并克服了重商主义者、配第和重农主义者所主张的只有对外贸易、生产金银的劳动或农业劳动才是财富来源的观点，第一次把价值归结为一般劳动。但由于受方法论和世界观的限制，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是二重的、在有些问题的论述上是混乱的。在价值论的发展史上，李嘉图的突出贡献在于，澄清了斯密的混乱，坚持和发展了斯密的正确价值规定，为劳动价值论的科学体系奠定了基础。

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之所以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来源之一，是因为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有其科学性的一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斯密第一次明确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并排除了从使用价值中去寻求交换价值的决

定问题。他认为，“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叫做交换价值。”斯密进一步指出，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决定，认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他不仅把交换价值的真实基础归结为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而且把价值量归结为商品内部凝结的劳动量，为劳动价值论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第二，李嘉图继承了斯密关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坚持了斯密关于使用价值不是交换价值尺度的正确观点，但他比斯密前进了一步。一方面，他既认识到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也认识到了两者的联系，认为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另一方面，他明确指出，绝大多数商品的价值完全取决于生产它们所耗费的劳动，“我的价值尺度是劳动量”。而且，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不是实际耗费的个别劳动，而是社会必要劳动，因而决定价值量的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他进一步指出，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商品的价值与投入它们的劳动量成正比”。李嘉图批评了斯密的二元劳动价值论，认为其劳动价值论有不少的错误。一是混淆了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和交换到的劳动，而这两者在量上是不相等的，购买到的劳动不能成为价值的尺度；二是将商品的价值决定与价值分配混为一谈。一种商品生产出来后，它的价值可以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分配，但这种分配不仅不会影响到价值的质，也不会改变价值的量，它只能以商品的价值量为限度，交换活动是

不能增殖的,因而斯密教条是错误的。李嘉图清楚地看到,价值是第一性因素,而分配则是第二性因素。虽然李嘉图的研究仅限于价值量,但“李嘉图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把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作了最透彻的表述和发挥”,因而在价值论的发展史中,李嘉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古典劳动价值论既有其科学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其不正确的一面。

第一,尽管斯密区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但是他的理解既肤浅又不正确。一方面他把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看作是价值的二重意义,而非商品的构成要素;另一方面,对于两者的关系又没有完全理解清楚,他只看到它们的区别,而忽略了两者的内在联系,即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从而留下了“水-钻石之谜”。斯密关于价值有三个规定:一是决定商品价值的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但是他又把这种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仅局限于有形的物质生产领域。二是商品的价值由商品所能购买到的或所能支配的劳动决定。“对于占有财富并愿意用以交换一些新产品的人来说,它的价值,恰恰等于它使他们能够购买到或支配的劳动量”。也就是说,斯密又认为商品价值来源于交换或流通领域,可以看出,这一规定与前一个规定自相矛盾。三是“无论在什么社会,商品的价格归根到底都分解为三个组成部分或其中之一。在进步社会,这三者都或多或少成为绝大部分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这样,工资、利润和地租就不仅成为一切商品收入的源泉,而且成为“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这就是经济学说史上的“斯密教条”。因此,从整体内容来看,斯密的劳动价值论虽然包括了某些科学成分,但它是混乱和自相矛盾的,也使自己的理论体系陷入困境。

第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在某些地方虽然比斯密前进了一步,但同样存在不少的问题。由于他不能正确理解劳动的二重性及其作用,就不能理解形成商品价值的实体是抽象劳动,更不能认识到具体劳动在价值形成过程中具有创造新的使用价值和转移旧价值的功能。他认为形成商品价值的劳动包括直接劳动与间接劳动,间接劳动即为投放在商品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从而得出物化劳动也能创造价值与剩余价值的错误观点。其原因在于他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永恒的,只注重对价值量进行分析,而忽略了质的研究。而且他把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必要劳动时间理解为在最坏的生产条件下所必须投入的劳动量。另外,李嘉图不能理解价值与生产价格之间的关系,而将两者混同;没有认识到价值规律的作用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变化,从而其价值论遇到了两大难题:即他无法在等价交换规律的基础上解释利润的来源;无法说明价值规律与平均利润

率的矛盾。

古典经济学家在价值论上的错误成为庸俗经济学家攻击劳动价值论的把柄,并导致了各种各样庸俗价值论的产生。其一是以萨伊为代表的效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实际上是混淆了使用价值和价值,把两者混为一谈,用创造使用价值的要素替代价值创造的要素,在这方面他比斯密还退了一步,受到了李嘉图的严厉批判。其二是以萨伊、西尼耳为代表的生产费用论或生产成本论,即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的一切投入要素或生产成本来决定,实际上是斯密价值论中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错误观点的变形,是用价格来决定价值。其三是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认为物化劳动同活劳动一样创造新价值,这实际上是李嘉图关于间接劳动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变种。这种理论后来被美国经济学家凯里发展为再生产费用论。

二、斯密与李嘉图劳动价值论局限性产生的根源

斯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之所以存在种种局限,其根源主要有三个方面:即理论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使用的方法论和立场问题。

1. 社会历史条件

研究社会关系的任何经济学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它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反映与产物。斯密所处的历史时代,正是资本主义由手工工场向机器大生产过渡的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商业资本家逐渐被工业资本家所替代。新兴的产业资本家为进一步促进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要求有一个主张经济自由、反对国家干预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在此历史条件下产生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斯密之所以能够提出劳动价值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工业资本家已掌握了资本主义财富及其源泉的规律,要求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进行重新修正,即要求重新认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来源。而对国民收入进行重新认识,必须首先正确认识价值。二是由于当时正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初级阶段,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和市场竞争的激烈性以及利润追求的无限性,迫使资本家必须关心和计算生产商品的劳动耗费与交换的比例,从而要求经济学去科学研究价值。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与发展,商品经济逐渐趋向于成熟,为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提供了研究的对象和历史条件,使他能够认识到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别与价值的规定。但是,斯密所面对的只是一般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商品经济还没有发展到其成熟阶段,它的各种矛盾还没有充分地体现出来,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定性不是十分成熟,社会劳动的流动性也不是很全面和经常,因而他看不到价值的本质及其矛盾。他不知道货币的性质及其与价值的关系,因而他在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中先论述货币而后论述价值。斯密虽然也意识到了价值的创造与价值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分配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但他无法对其进行深入阐述和系统说明,只好割断其与资本主义的内在联系,认为商品的价值由所耗费的劳动来决定的科学结论只符合“初期野蛮社会”的简单商品生产,而到“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制时期”,商品的价值就“由购买到或支配的劳动所决定”。同时,他虽然看到了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但他没有看到它对商品生产者的分化作用。从而,他的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也因此大打折扣。

在李嘉图生活的时代,英国已进入到机器大生产的工业时代,这就为李嘉图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典型的对象和具体条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李嘉图时代,商品经济处于比较发达的阶段,商品经济的很多矛盾,如价值规律与利润之间的矛盾、价值规律与平均利润规律的矛盾等,都已体现出来。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也开始出现并逐渐激烈。李嘉图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三个阶级的收入来源和相互联系,初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利益的对立。这说明,李嘉图开始找到了正确的研究方向,也说明他是一位诚实的经济学家。但是,由于李嘉图时代正是资本主义经济上升的时期,特别是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巨大生产力为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经济危机还没有爆发,工业革命的儿子——无产阶级还没有成长起来。这使得李嘉图看不到资本主义的末路,使其劳动价值论充分体现了上升时期的中产阶级的先进性与革命性,同时也使得他把资本主义看作是最合理的和永恒的社会生产方式,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永恒的。所以他只注重研究价值量,而忽略了价值本质的研究,不理解生产商品的劳动为什么和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要转化为价值,也不理解商品交换的实质就是商品生产者劳动的交换。

2. 方法论上的局限性

斯密劳动价值论及其他理论的矛盾,与其研究方法的二重性有必然的联系。斯密在《国富论》中使用了两种方法:一种研究方法是内在观察法,即科学抽象法,它探索各种经济范畴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内在联系,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隐蔽结构;另一种研究方法是外在观察法,它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的表现形式加以描述、分类、叙述并归入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一方面,他试图把本质与现象区分开来,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的内在联系与生理结构,从而能够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但另一方面,当遇到资本主义的外部表象时,为了使问题在形式上得到解决,便只是肤浅地对它进行描述,得出了一些错误的和自相矛盾的结论。由于他

不了解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因而对许多问题的研究只能停留在形式上,而不能深入到本质内容去进行研究。正因为如此,他对于价值与其外在表现形式的交换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就不能理解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而把交换价值等同于价值。同时,他虽然观察到了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的作用形式不同,也发现了价值规律同资本与劳动的交换规律相矛盾,但他不能也不愿从本质上去解释它们,而把这些矛盾抽象掉,并通过收入决定价值的错误观点来进行解释。斯密的这种研究方法受洛克哲学思想的影响很大,而洛克的哲学思想深受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具有彼此独立研究的局限性,习惯地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或静止化,并不把它们当作本质上变化的东西。因此,斯密在研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一方面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自然的和永恒的,另一方面也使得自己的理论静止化。

李嘉图比斯密较为科学地运用了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他能够通过内在观察法,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去探究其本质内容,因而在劳动价值论上比斯密前进了一步。而且,李嘉图有意识地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纷繁复杂的阶级关系抽象为三个主要的社会阶级的关系,并对此进行研究。他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三个阶级收入的来源与相互关系,初步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利益的对立,并从阶级利益对立的研究中去揭示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从而把古典经济学推向了高峰。但是其方法论也存在着错误与缺陷,首先,李嘉图不明白本质为什么要通过和它不直接同一的形式表现出来,他把社会规律等同于自然规律,忽视了社会规律的历史性,也得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性和价值规律适应于一切社会的结论。同时,由于他坚持使用一元论的抽象法,认为绝大多数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是按照等价交换原则进行的,只有资本与劳动的交换是一种例外,但无伤大局,也使得其劳动价值论陷入两难境地。再次,他经常混同价值与交换价值,对于价值的实质与形式不甚了解。

3. 立场问题

古典经济学在立场上说是工业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他们所反映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处于上升和发展时期的工业资本家的利益。产业资本不同于商业资本,产业资本不仅在等价交换的原则下以剩余价值的形式剥削雇佣劳动,而且还要组织劳动。由于产业资本占据统治地位,流通领域成为独立于生产过程之外的从属因素,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引起理论及其研究对象的变化,因而代表产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古典经济学家能够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流通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与内在联系。就价值而言,斯密站在资产阶级的

立场上,批判了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的财富观,他试图通过市场价格在生产领域内寻找和解释一切社会财富的源泉,斯密教条为产业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提供了理论基础,认为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与工人出卖劳动力获得工资等同,从而使劳动价值论陷入庸俗。

李嘉图时代,由于社会的主要矛盾还是工业资产阶级与掌权的土地贵族的矛盾,因此,作为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李嘉图在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条件时,能够毫无顾忌地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部联系中,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进入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充分发展,又使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本质的分析超过他的前辈。作为下院议员,他在其著名的《关于对农业的保护》及《谷物法》中的主张都是从维护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的,他认为只有允许谷物自由贸易,进口低价谷物,才能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提高工业资本家的利润,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因为如此,李嘉图成为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

三、几点借鉴意义

1. 任何经济理论都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所有经济理论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从而使任何经济理论都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因此,对劳动价值论、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应重新审视。一方面,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对前人科学成果的批判与继承,由于当时的资本主义发展也不十分完善,他所能运用的材料不十分的详尽和完整,所能借鉴与汲取的理论财富同样有限,他对某些问题的论述不可能详细,故其劳动价值论也并非十分完美,具有可发展的地方与环节。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为一个开放性的理论体系,应该能包容和兼收其他各学派与本学科的先进的和科学的养分,这样才能有利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随着社会的发展,商品经济的不断完善,劳动价值论所研究的对象和材料日益扩充,因此,丰富和发展劳动价值论已成为必然。

目前,建立中国特色的劳动价值论已经有了较好的历史条件。首先,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已充分发展,商品经济的各种矛盾逐渐以成熟的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其次,社会主义作为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社会形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紧密相联系的基本特征,但目前公有制的内容和实现形式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公有制。我国目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相并存的结构;同时公有制也有多种实现形式。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多层次性和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为新的

劳动价值论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研究领域。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也是劳动价值论应该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基础,因此必须在理论上重新审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公有制的内容,更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概念。与此相应,应克服以往劳动价值论的缺陷和不足,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劳动价值理论与分配理论,既要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同时也要注意劳动价值理论与价值的分配是不同的,两者不能相互替代。劳动价值论反映的是价值的形成和源泉,什么样的劳动能创造社会财富或是社会财富的终极源泉,但它并不能反映个人或企业相互之间的经济利益,即它不能反映社会内部的经济利益关系,只能在质与量上反映社会的整体利益或社会财富的增长状况。因此,正确的劳动价值论应该能引导人们加大对国民经济各生产部门劳动的投入、加强高度社会分工条件下的生产协作、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它还能检验现存制度的优点和不足,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往往与其经济利益是紧密联系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有反作用,经济利益是调动人们生产积极性的激励机制。社会财富的生产过程是人们的生产劳动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过程。因此,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投入的积极性,新价值分配理论就应具有一种这样的激励机制,能充分调动人们各方面的生产积极性,能充分体现社会内部的经济利益关系和相互协作关系,反映社会各成员或各集体之间对社会财富增长在贡献上的个体差异,反映社会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反映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这就是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不能单纯以劳动价值论去说明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否则,就会使劳动价值论陷入庸俗的泥潭。也不能以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理论去代替和说明劳动价值论,犯与“斯密教条”同样的错误。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相结合的分配方式,有利于充分发挥和调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要素投入的积极性,具有一种激励作用;同时能合理地协调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利益关系,有利于构建和谐和谐社会。但是,劳动价值论是分配理论的逻辑起点,即社会财富的分配必须以社会财富的增量及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前提。

2. 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经济学都面临着一个立场问题

立场问题最终决定了研究方法,有什么样的立场,就有什么样的方法问题。古典经济学是站在资

产阶级的立场,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去研究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它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使得古典经济学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又使得它陷入庸俗的泥潭之中,这也是它的立场问题的逻辑结果,因为它只注重本阶级的利益研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反映社会关系发展变化的规律的研究方面。因此,我们在构建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时,应始终站在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去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另一个问题,这不仅是古典经济学所忽略的问题,也是过去我们所忽略的问题,即从生态学的视角,或者站在大自然的角度,重建人类和大自然之间的关系,平等地和善意地对待大自然,去研究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和寻求它们的演变规律。自然史是劳动史内在的和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和自然界的历史无疑是处在一种辩证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中”。生产力反映的是人与大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过去我们一味地强调人类对自然界征服和改造中的主体作用,很少考虑大自然对人类的这种能力的制约。用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去替代大自然本身的规律,实际上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规律。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正是只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片面的追求财富量的增长,忽视大自然本身的规律,把对大自然的利用建立在资本积累的基础上,这必然会造成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大自然之间的不和谐,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带来诸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3. 从古典经济学的建立到李嘉图学派的终结,说明新的经济学理论的建立都必须从研究方法方面取得突破和变革

建立中国特色的劳动价值论也应以方法论的创新为前提。第一,应坚持归纳与演绎相结合。通过归纳法,可以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从客观具体的事物发展变化中找到本质;而演绎法可以得出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科学认识,指导客观具体实践。只有归纳法而无演绎法,可能会得出具有偶然性的结论,使理论不具备普遍的指导意义;而如果只有演绎法而无归纳法,则可能使我们的理论缺乏客观性。因此,必须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对此,恩格斯曾经指出,“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然相互联系着的。不应该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第二,对待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不能采取“单向度”的方法,即只吸收而不批判,或只否定而不继承和发展其科学的和合理的成分。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一方面应坚持批判与继承劳动价值论,应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与基本观点来指导我们

的实践,这样才能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对其不完善的和不详尽的理论应补充和完善;另一方面,应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理论来源于实践,但科学的理论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地得到检验才能逐渐完善,也才能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应从能否促进生产力出发,寻找和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不能因理论而理论,否则就会使理论僵化而陷入庸俗的泥潭之中。不能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盲从,不能因坚持经典的劳动价值论而对已经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的现实予以否定或怀疑,否则,就不能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第三,坚持总量分析与个体分析相结合。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只有抽象的总量分析,把总量理解为个体简单加总,而非有机的统一体,忽略了个体之间相互关系,因此,他们的劳动价值论脱离了现实或缺乏现实的基础,与客观的现实形成反差。总量分析与个体分析相结合,即要求从辩证统一的角度将两者结合起来;既能从总量到个体,又能从个体返回到总量。这样,劳动价值论才能具有科学性和发展性。

注释: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文版,上卷,25、26、26、45、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中文版,第2卷,19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文版,1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5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主要参考文献:

1. 余孝军:《对亚当·斯密劳动价值论的理性分析》,载《渝西学院学报》(社科版),2004(3)。
2. 马路远:《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评述》,载《昌潍师专学报》,2000(2)。
3. 韩建新:《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逻辑演进》,载《晋东南师专学报》,2004(2)。
4. 陈孟熙:《经济学说史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6.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7. 汤在新、颜鹏飞:《近代西方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8. 蒋自强、张旭昆、袁亚春、曹旭华:《经济思想通史》,第3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商学院 湘潭 4111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武汉 430060)
(责任编辑: N)